



民国浙江史研究丛书

浙

民国浙江基督教教育研究

——以“身份建构”与“本色之路”为视角

周东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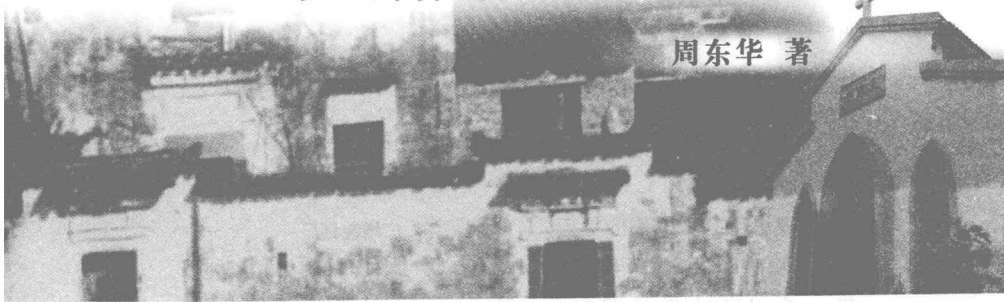


民国浙江史研究丛书

民国浙江基督教教育研究

——以“身份建构”与“本色之路”为视角

周东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浙江基督教教育研究 / 周东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8

(民国浙江史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04 - 9012 - 8

I. ①民… II. ①周… III. ①基督教 - 宗教教育 - 研究 - 浙江省 - 民国 IV. ①B977. 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7288 号

责任编辑 官京蕾

特约编辑 大 乔

责任校对 高 婷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316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

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借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的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

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养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蕴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

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序

赵洪祝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称“文物之邦”，从史前文化到古代文明，从近代变革到当代发展，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勤劳智慧的浙江人民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与创新，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具有鲜明浙江特色、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思想内涵的地域文化，这是浙江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如何更好地使这一文化瑰宝为我们所用、为时代服务，既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深入挖掘、整理、探究，不断丰富、发展、创新浙江地域文化，对于进一步充实浙江文化的内涵和拓展浙江文化的外延，进一步增强浙江文化的创新能力、整体实力、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发挥文化在促进浙江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浙江省委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早在1999年，浙江省委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2000年，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5年，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

努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地方文化研究项目之一。该工程旨在以浙江人文社会科学优势学科为基础，以浙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现实课题和浙江历史文化为研究重点，着重从“今、古、人、文”四个方面，梳理浙江文明的传承脉络，挖掘浙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推出一批在研究浙江和宣传浙江方面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和良好社会效益的学术成果，培养一支拥有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梯队，建设一批具有浙江特色的“当代浙江学术”品牌，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升浙江的文化软实力，为浙江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有力的智力支持，为提升浙江文化影响力、丰富中华文化宝库作出贡献。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开展三年来，专家学者们潜心研究，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在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等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已设立 10 余个系列 400 余项研究课题，完成 230 项课题研究，出版 200 余部学术专著，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些阶段性成果，对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提供了新的支撑力和推动力。

党的十七大报告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并坚持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推进创业创新的重要支撑。2008 年 6 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对兴起文

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浙江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行专题部署，制定实施了《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明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要任务是，在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的同时，继续深入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三大体系”，努力使我省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文化建设方面继续走在前列。

当前，浙江文化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也面对十分严峻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始终保持浙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更好地发挥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不断探索的重大新课题。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更得力的措施，大力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回答浙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努力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努力形成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

继续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我们热切地期待有更多的优秀成果问世，以展示浙江文化的实力，增强浙江文化的竞争力，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力。

2008年9月10日于杭州

序

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与 基督教教育的身份变迁

王立新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基督教教育史持续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尽管仍不时有教会学校从事“文化侵略”的指责，但国内绝大多数学者更愿意把教会学校纳入中西文化交流的视野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考察，并对教会学校的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近几年来，关于教会学校的研究成果迭出，其中不乏精细或宏大之作，但从研究视角来说却较少创新。东华的这部著作则另辟蹊径，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即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的身份变迁来重新审视民族主义大潮下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的命运。更为可贵的是，作者专注于浙江一省，其研究更精细、更翔实。

正如本书所表明的，中国基督教教育的身份变迁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近代中国几乎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动都会把基督教教育的身份问题凸显出来，中国社会对教会学校及其毕业生身份的认知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命运。一个人能否既服侍上帝，又服务于他的国家？一个中国人皈依基督或接受教会学校的教育后是否仍然可以成为一个爱国者？这些问题在现在看来似乎有些可笑，但在近代中国却

是极为严肃的话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曾影响无数所教会学校和千百万中国基督徒的命运。

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尽管教会学校招收的是中国学生，但教会学校一直被视为移植到中国的“外国人”的学校。学校的管理者和教师是外国传教士，资金来自国外差会的拨款，教学内容为基督教和西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会学校的办学目标是吸引中国学生受洗和培养中国本土的布道人才，因此并不是基于中国的需要，而是服务于外国人——即来自西方的基督教团体的需要。这一时期的教会学校并没有身份上的困惑，无论是办学自己还是中国社会对教会学校的认知都是相同的——它们是在中国传统教育之外存在的受不平等条约保护的截然不同的学校，是移植到中国的舶来品。如果说教会学校存在身份不清问题的话，那也不是指其与中国社会的关系，而是就教会学校与差会的关系而言——教会学校究竟应该仅仅是传布福音的工具，还是具有独立教育使命、向中国传播西方文明成果的教育机构。这在早期的基要派和自由派传教士之间就有很大的争议，20世纪初期社会福音运动和现代派神学兴起后，这一争论甚至更加激烈。

作为外国人办的学校，这一时期教会学校虽然有很大发展，但基本上在中国社会处于边缘的地位。尽管近年来对教会学校的研究强调教会学校在输入西学、促进中国教育改革方面的作用与影响，但如果我们本着历史主义原则把教会学校置于19世纪中国社会环境中审视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教会学校实际上为中国社会主流所鄙视——其学生大多为贫寒人家的子弟，其文凭也无法得到政府的承认，大多数读书人追求的仍然是科举入仕之路。1905年科举制废除和1906年各地开始设立新式学堂后，中国社会对教会学校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改观。

一些教会学校还成为中国建立新式学堂时效仿的榜样，教会学校毕业生的社会地位也得到提高，不少教会学校毕业生成为中国新式学堂的教习或进入通商口岸的海关、电报、邮政等部门工作。但在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上，教会学校仍然被视为外国人办的学校，1906年学部的教育咨文称教会学校为“外国人”设立的学堂，“毋庸立案”，实际上是不承认教会学校的文凭，仍把教会学校当作“外来者”而有意忽视。

尽管教会学校的管理者对中国政府歧视教会学校的文凭啧有烦言，但一直到20年代中期，教会学校的这一“外国人”教育身份并没有给教会学校带来麻烦。教会学校凭借不平等条约保护和来自欧美充足的办学资金以及富有特色的教育方法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基督教教会内部社会福音运动和现代派神学的兴起也使教会学校越来越强调教育使命而淡化宣教目标，特别是教会大学进行了合并和重组，质量大为提高。20世纪的前25年成为教会教育发展的黄金时代。

但是，就在教会教育迅速发展的时候，危机也在悄悄地降临。随着中国开始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教会学校的身份开始被质疑。在民族主义者看来，教会学校的“外国人”身份使其成为欧美国家在中国领土上的教育“飞地”，它们在中国长期存在非常不利于中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20年代突如其来的民族主义大潮把正处于大发展时期的教会教育置于尴尬，甚至是危机的境地。教会学校被指责侵犯了中国的教育主权，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而教会学校毕业生被认为漠视中华民族的命运，缺乏爱国主义精神。尽管教会学校对民族主义者的指责深感冤枉，但这种指责也并非完全子虚乌有：教会学校的管理者仍然主要是西方人，教学内容仍然带有强烈的洋化色彩，其毕业生大多受雇于教会学校、医院和教会。一言以蔽

之，教会教育仍然主要服务于与教会和西方相关的事业，教会学校及其毕业生的生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中国的政治与思想生活相脱离。

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实际上把教会学校的身份问题突显出来：教会学校的（外国）基督教身份与其应该具有的（中国）国民身份是矛盾的，教会学校必须放弃其基督教身份才能获得国民身份。因此 20 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主权运动导致了教会学校的身份危机。在中国激昂的民族主义浪潮下，基督教身份和中国国民身份二者实际上不可兼得。解决这一矛盾的方式就是中国化。教会学校重新确立其目标，那就是为中华民族服务，用本书作者的话来说，那就是从培养“新教民”转变为培养“新国民”。到 30 年代，绝大多数教会学校向中国政府注册，接受中国政府的管理，大多数教会学校的校长也开始由中国人担任，来自中国方面的资金逐渐增多。在教学过程中，宗教课程开始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而三民主义却成了必修课。

抗战期间，教会学校在倡导人格救国、提供战时医疗服务以及为抗战培养人才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以其行动证明了教会学校在为中华民族服务方面并不比中国的国立学校逊色，一个基督徒完全可以成为伟大的爱国者。抗战胜利后，教会学校获得了完全的公民身份，教会教育成为中国国民教育的一部分，也正因为如此，教会学校在战后的恢复与重建过程中得到国民政府的大力援助与支持。

然而，就在基督教教育似乎已经获得完全的国民教育身份后不到五年，基督教会和基督教教育重新遭遇了 20 年代的那种身份危机。教会学校虽然具有“国民”的身份，但是由于其保守性质及其与西方的联系，它被排斥在“人民”之外，

教会学校面临的问题不再是“中国化”的问题，而是“革命化”的问题，即是否要实现从“国民”到“人民”的转变。耐人寻味的是，20年代的“中国化”并没有完全消除教会学校的基督教色彩，教会教育的民族性和宗教性实现了共存，而50年代初教会教育的“革命化”和向“人民”教育的转变则彻底清除了其宗教性，教会学校在中国也彻底消亡。

教会学校的身份变迁及其命运实际上与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和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晚清时代的中国把自己视为一种文化，对基督教和教会学校的指责在于基督教与儒家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并威胁了中国的文化正统，因此这一时期主要是文化上排斥基督教。由于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这种排斥无法把基督教和教会教育阻挡于国门之外，清政府采取的策略是将其视为异类，而不予承认。进入20世纪，当中国的政治与知识精英努力把中国打造成拥有统一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时候，对基督教和教会学校的指控则主要在于教会教育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教会学校毕业生“崇洋”和缺乏对国家的忠诚。显然，对基督教和教会学校的批判从文化层面转向政治层面，基督教教育被认为威胁了中华民族这一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团结和统一。而到了1950年，新中国把自己界定为一个反帝、革命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教会学校的主要罪状与其说是“崇洋”和“亲美”，不如说是“反对革命”，也就是威胁了“革命国家”的巩固和统一。实际上，基督教和教会教育在近代中国的身份构建中长期扮演了“他者”的角色，始终被认为是中国正统和中国身份的对立面，不管这一正统是儒家文化、民族主义，还是共产主义。从这个角度说，近代中国对基督教和教会教育的认知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当然，其中的变化也是明显的：其一，20年代中国政党政治出现后，国家建构

的需要与政党的意识形态需要融合在一起，中国基督教教育机构被认为是以服务于西方的意识形态为目标，从而不仅不利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更不利于政党意识形态目标的实现；其二是中国正统本身发生了变化，成为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中国兼具现代民族国家和革命国家的双重特性，而这才是 50 年代初期教会学校在中国大陆消亡的深刻背景。

东华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从事东亚现代化的研究，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相当熟悉。他近年来关注的中国基督教史虽然与其原来的研究领域相差较远，但其良好的理论素养和跨学科的视野使他往往能在寻常的材料中发现新的意义，近来发表的有关成果常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本书运用丰富的史料，对浙江基督教教育的身份变迁以及教会学校在不同身份下的挣扎与活动，特别是浙江教会学校对中国现代化事业和国家建构的贡献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描述。其研究从一个侧面说明，只有善于挖掘新材料，运用新方法和采用新视角，中国基督教教育史研究才会有广阔的前景，新一代的年轻学者在这方面大有作为。